

对《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的补说

魏崇武

《文献》2000 年第 2 期《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以下简称《一则》)一文,对河北省鹿泉市龙泉寺一通元碑的碑文内容及其相关史实作了有益的探讨,笔者读后颇受启发。不过,该文对所附载的王思廉《龙泉院营建记》一文中对“张公”的介绍有一些欠妥,笔者不揣愚陋,略为补说,谨供参考。

《一则》介绍说:“文中提到的张公洎,字奉先,又名荣祖,世为获鹿人。张奉先初为获鹿县尉,及县改西宁州,迁为县令,为史天泽所倚信,累功至西宁州事。其事迹见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一文。”

按:元好问《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云:“公讳荣祖,字孝先,姓张氏,世为获鹿人。曾王父明、王父显、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帅府监军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军士。贞祐改元之明年,六飞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乡曲之誉,辟监军,为本县尉。及县改西宁州,迁县令。未几改代,为今经略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监军兼行西宁州事。被檄招集未附,为叛者所胁,偃蹇不屈,竟及于难。幕府存念劳旧,以军属公,兼领县务。时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就此,我们可以知道:

1. “张公”名荣祖。所谓“张公洎”没有根据。洎,与也。
2. 张荣祖字孝先,而非“奉先”。那么,吴先生“奉先”一说

的根据在哪里？原来，《龙泉院营建记》一文在后面又写道：“因忆甲寅九月，先大夫同张丈奉先诸君陪遗山先生会饮于斯，留题石刻故在。”显然是将这里的“张奉先”误认为张荣祖了。王思廉《龙泉院营建记》写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这之前的甲寅年是元宪宗（蒙哥汗）四年（1254）。而根据元好问《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一文的记载，张荣祖“不幸遭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终于私第之正寝”，此“庚戌”乃蒙古海迷失后称制二年（1250）。那么，张荣祖到甲寅年已去世四年，怎么还能陪元好问喝酒呢？可见，张奉先不是张荣祖。

那么，张奉先是谁？且再看《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初，监军（按：指张昇）没，其子继祖才十岁，公（按：指张荣祖）袭其任三十年。于今伋辈（按：张伋为张荣祖长子）既冠婚矣，公念为叔父所保养，生死报之，屡以县章让继祖，至于再三，辞旨恳切，人为感动。经略公（按：指史天泽）不之许，……及病且革，复申前请，幕府不得已许之。”由此可知，在张昇遇难后，张荣祖承袭了叔父的职位，而后来，堂弟张继祖成为张荣祖的继任者。另，元好问《甲寅九日同临漳提领王明之鹿泉令张奉先贾千户令春李进之冀衡甫游龙泉寺僧颢求诗二首》诗题所反映的重阳节游龙泉寺的事^①，与王思廉《龙泉院营建记》所提及的他父亲和张奉先等人陪元好问在龙泉院喝酒实际是同一天的事情，因此，这个鹿泉令张奉先毫无疑问就是张继祖，“奉先”是张继祖的字，而不是张荣祖的字。

3. 通过上面对元好问《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一文内容的引证，可知《一则》一文所谓“张奉先初为获鹿县尉，……累功至西宁州事”实际上是错将张昇的履历当成张荣祖的履历来介绍，却因为对“奉先”谁属的错误认定，最后，张昇的履历又变成了张继祖的履历，这就有点错上加错了。

此外，《一则》中所标示的王思廉生年有误，应是公元1238年，

而非 1237 年。^②还有，《一则》说王思廉“幼从元好问就学于获鹿县境内的封龙书院”，说白朴、李文蔚为王思廉的“同窗”，“都曾就学于封龙书院，是元好问的学生”等，恐怕有点缺乏根据。^③

以上是笔者对《一则》一文的几点意见，敬请批评指正。

注：

①《遗山先生文集》卷 10，《四部丛刊》本。

②《元史·王思廉传》：“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延祐七年为公元 1320 年，那么王思廉生年应该是公元 1238 年。

③笔者查阅了缪钺先生《元遗山年谱汇纂》、李修生先生《白仁甫年谱》等，没有见到有关元好问在封龙书院讲学以及白朴、王思廉在封龙书院读书的材料。虽说白、王二人都是元好问的学生，但“同窗”就未必了，因为白毕竟比王大了 12 岁。有关李文蔚的材料极少，我们只能从《录鬼簿》中得知他是真定人，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从白朴〔夺锦标〕《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书》词，可知白、王、李三人曾在封龙山同游。仅此而已。至于封龙书院，它在元氏县境内，而不是在获鹿县境内。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上接第 277 页）

注：

①《辞源》（修订本）“晏婴”条：晏婴“字平仲（一说谥平仲，又说平为谥，仲为字）”，依违不能定，其实谥平、字仲才是正确的。《史记·管晏列传》索隐：“名婴，平谥，仲字。”司马贞之说是正确的。

②《史记·魏世家》：“魏绛卒，谥为昭子。”魏绛谥昭，加上“子”是表示美称，不应统视为谥号。《赵世家》：“赵武死，谥为文子。”也不恰当。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